中国音乐学（季刊）2011 年第 1 期
MUSICOLOGY IN CHINA

□宫宏宇
GONG Hong-yu

杨荫浏的传教士老师——郝路义其人、其事考

The Missionary Who"Discovered"Yang Yinliu: The Life and Work of Louis Strong Hammond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42（2011）01-0046-09

引　言

有关杨荫浏的研究大都提到传教士郝路义在杨先生人生中的重要性，但对郝氏本人及其在华事迹却都语焉不详。本文即以郝路义本人为焦点，考证其人、其事。本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详述郝路义本人的家庭背景及其所属的差会；第二部分聚焦郝路义与杨荫浏的交往，其目的除厘清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以讹传讹的现象外，还旨在指出海外学者新近的研究及有关档案资料之所在；第三部分审视郝路义有关中国古代诗词之论著和她对 20 世纪初期在美国掀起的第一次翻译学习中国古诗高潮的关注，同时，也涉及到她创作的歌词和翻译的抗战歌曲；第四部分把焦点转向郝路义的音乐理论与实践，通过叙述她与裘昌年（1869-1931）等江南文人的合作，来凸显她在中西音乐融合上——特别是在利用中国词乐来创作基督教礼乐音乐上——所做的尝试。与国内近期的研究不同，本文所采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1.郝路义姐姐尤妮斯·娣简丝（Eunic Tietjens，1884-1944）的自传《世界与我擦肩过》（*The World at My Shoulder*，1938）、拜瑞（Stuyvesant Barry）1973 年完成、但从未正式出版的《劳伦斯·哈门德的故事》（*Hammond as in Organ—The Laurens Hammond Story*）；2.郝路义自己的英文文章；3.新教各教派在华的全国性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所刊载的有关郝路义的形迹。

一、郝路义、家庭背景及其所属差会

郝路义英文名为露易丝·斯特朗·哈门德（Louis Strong Hammond，1887-1945），是美国新教圣公会团（The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传教士。美国新教圣公会团是较早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差会之一，在晚清时就开始向中国派传教士。该会在中国的总部设在上海，但在无锡、南京、武昌、汉口、烟台和北京也有传教点。早期著名的传教士包括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46-1891）和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831-1906）。前

收稿日期：2010-09-30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男，博士，新西兰国立 UNITEC 理工学院高级讲师。

者 1843 年到上海后即开始创办学校和医院。后者以 1875 年翻译官话《旧约全书》[①]和在上海创办圣约翰大学闻名。[②]

郝路义 1887 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斯 (Illinois) 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双亲的先祖都来自英国,皆笃信基督教但非常富裕。她的父亲威廉·哈门德 (William A. Hammond) 虽然学历不高,但事业上比较成功,曾任伊利诺斯第一国民银行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of Illinois) 的经理。郝路义的母亲艾迪亚·路易斯·斯特朗 (Idea Louise Strong) 1859 年出生在美国东北部俄亥俄州甘比亚 (Gambier) 的一个农场,爸爸是牧师,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与银行家的丈夫不同,她 12 岁时就到芝加哥上学,先后在有名的私校洛克福德女子中学 (Rockford Seminary) 和芝加哥美术学院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受过很好的教育。她本来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画家,但 1883 年与威廉·哈门德结婚后,只得放弃。据郝路义弟弟回忆,像所有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她们在芝加哥艾文斯顿 (Evanston) 有一幢大的漂亮的房子,离秀丽的密执安湖只有数米之隔。家中不但有很多仆人,还有车夫和专门照顾小孩的法语家庭教师。[③]在父亲 1897 年意外地溺毙之前,郝路义一家一直住在上述芝加哥市郊的豪宅中。父亲去世后,妈妈带她们姐弟 4 人去了欧洲。一是重新实现年轻时当画家梦想,二是为了节省开支,因为欧洲的消费比美国要低。1899 年他们全家在英国和法国短暂停留后,又去了瑞士和德国,所以郝路义和她的姐弟在日内瓦 (2 年)、德累斯顿 (2 年)、巴黎都上过学。妈妈还曾在巴黎办过个人画展。[④]

郝路义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四人随母亲,都与文学艺术有缘。姐姐尤妮斯 (Eunice) 出生于 1884 年,虽然对瓦格纳极其崇拜,后来却成为了美国著名的印象派诗人和作家,并曾在欧洲做过战地记者,写过游记和儿童故事,还曾当过编剧。她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却在佛罗里达大学当过两年教师 (详见下文)。妹妹伊丽莎白 (Elizabeth) 是个不错的大提琴手,曾在美国和东亚的交响乐团任独奏,可惜英年早逝。[⑤]弟弟劳伦斯·哈门德 (Laurens Hammond,1895-1973) 毕业于著名的长春藤名校康乃尔大学,虽然也很早就学习音乐,但他的成就更显现在发明上,特别是郝氏电子风琴的发明,《格罗夫》都有专门条目介绍[⑥]。这里需要特别介绍的是郝路义的姐姐尤妮斯。

郝路义的姐姐尤妮斯 1904 年嫁给美国著名作曲家保罗·娣简丝 (Paul Tietjens,1877-1943) 后随夫姓娣简丝。保罗·娣简丝是美国 20 世纪初期著名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其 1902 年为鲍姆 (L. Frank Baum,1856-1919) 的百老汇歌舞喜剧《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的配乐。保罗·娣简丝后来有创作过几部歌舞剧,如《神圣的大蛇》(*The Sacred Serpent*)、《献给灰姑娘的吻》(*A Kiss for Cinderella*) 等,但都没有像《绿野仙踪》那样一炮打红,直到现在还是百老汇经常上演的剧目。除了流行的歌舞剧外,保罗·娣简丝也写过几部交响乐、一部协奏曲、一些奏鸣曲和室内乐。严肃作品中,他的歌剧《阿拉伯人的帐篷》(*The Tents of the Arabs*) 最有影响。保罗和尤妮斯有两个女儿,其中大女儿 4 岁时不幸夭折。这也是尤妮斯 1914 年与保罗离异的原因之一。虽然尤妮斯与保罗离婚,1920 年改嫁给美国剧作家克洛伊德·韩德 (Cloyd S. Head,1886-1969),但一直用前夫的姓,直到她 1944 年去世。

尤妮斯·娣简丝本人是美国颇有名气的意象派诗人兼儿童文学作家。她不仅与蒙罗 (Harriet Monroe,1860-1936)[1]、洛威尔 (Amy Lowell,1874-1925)、庞德 (Ezra Pound,1885-1972) 等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欧美诗人有过交往,与中国诗人闻一多也有过交往,对闻一多的诗作还有过不小的影响。闻一多在其书信中曾提到 1922 年 12 月 1 日会见娣简丝时,"伊教我在多译几首,同伊酌了字句,伊当送给 Harriet Monroe [蒙罗] 选登《Poetry》"。[⑦]遗憾的是,国内外有关娣简丝对闻一多影响的研究不少,但似乎没人知道她就是郝路义的姐姐。也很少有人提到她们姊妹俩曾在 1931 年出有一本中国游记的故事书 (*Burton Holmes Travel Stories: China*)。尤妮

1 值得注意的是,蒙罗也与中国有缘。1910–1911 年蒙罗到中国看望她当时为美国驻华大使夫人的姐姐 (妹妹),这次中国之旅使得她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勃兴。回到美国后,她创办了《诗歌》,通过这一期刊,她为美国读者介绍了"意象主义者" (Imagists) 和其他"新诗"。

斯·娣简丝的文学生涯开始于 1909 年全家回到芝加哥后，最初她以为报刊写系列专栏为生，1912 年受芝加哥一些文人朋友们的鼓励，娣简丝开始更多倾向于诗歌的创作，从而开始了她与芝加哥《诗刊》创始人蒙罗 25 年的友谊。《诗刊》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从其撰稿人的组成即可窥见一斑。上世纪 20、30 年代为《诗刊》投稿的诗人包括意象派运动发起人庞德、叶慈（William B. Yeats，1865-1939）、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等。泰戈尔最早的英文诗也是在此刊物上发表的。⑧尤妮斯 1915 年成为《诗刊》的助理编辑。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似乎已得到承认，上世纪 60年代就有专门研究她生平及创作的博士论文出现⑨，欧美大的文学词典也都有关于她的词条，如 1995 年版的《牛津美国文学词典》中也有关于她的条目。有意思的是，娣简丝在郝路义抵华一年后就同母亲、妹妹和女儿一起来过中国，并在无锡住过一段时间。⑩她后来写的诗集《中国侧影》（*Profiles from China*）（1917）就是这次中国之旅的产物。尤妮斯·娣简丝创作的诗词《木地情歌》（*Woodland Song*）也曾被美国当代作曲家查尔斯·毕翅·豪立（Charles Beach Hawley，1858-1915）谱写成歌曲，在美国广为流传。

二、郝路义与杨荫浏

有关杨荫浏与郝路义的关系，国内的研究一般都以杨荫浏晚年在《最后的课》中的说的一段话为依据。⑪这里，他不仅提到他“十二岁那年，遇到美国传教士郝路义”，还提到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她很喜欢我……我曾称为‘干妈’”）、郝氏对他的培育（“教我学英语和外国音乐……开始上视唱课，后来学作曲”）和郝氏对他的最终期望（“她是想把我培养成宗教音乐家”）⑫。把杨、郝二人的初次接触说成是杨“十二岁那年”，应是杨先生记忆有误。郝路义是受美国新教圣公会团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她的来华日期和行踪在教会的刊物《教务杂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据《教务杂志》“抵华传教人员”报道，郝路义是 1913 年 9 月 27 日才抵华的。⑬杨先生出生于 1899 年 11 月 10 日，那时的杨荫浏应已近 14 周岁。至于华蔚芳、伍雍谊文中提到的杨 “10 岁时偶然见到了在无锡的郝路义”⑭和杨周怀先生所说的郝路义是在杨荫浏“十一岁时……去拜访杨荫浏的房东，听到杨荫浏在吹奏中国乐器，并且朗读中国诗词，就很喜欢这个小孩”的说法⑮，在年代上就更有问题了。

以往的研究主要提到郝路义对杨荫浏的影响。杨荫浏晚年在给研究生上的《最后的课》中和 1980 年 10 月 28 日接受张韶和余少华的采访中也都提到：“她教我英文，教我作曲，为什么要教我？后来大了，叫我去编赞美诗，后来我编了《普天颂赞》”⑯。的确，杨荫浏早年学习英语、西洋音乐技法、二十多岁时加入基督教、1928 年任“中华圣公会统一赞美诗委员会”委员、后来辞去教职专门编纂赞美诗、撰写基督教音乐的论文等都是郝氏直接影响的结果。30 年代末期当杨中断了与教会的联系，被聘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留在昆明工作时，又是郝路义“突然来看我，她建议我辞职，然后同她一起去上海，每月给我四百美元的薪水。我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听音乐、弹琴、画画，顺便把艺术的‘感情’‘找’回来”⑰。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郝路义对杨荫浏的事业影响深远，并不主要体现在传授他西方音乐知识和技能，而是在于杨很可能因为郝路义而得到家庭的支持，光明正大地学习音乐，又因郝路义走上职业音乐家的道路”⑱。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杨荫浏对中国音乐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郝氏的影响。杨荫浏本人后来在《西方民族音乐观》一文中就说过：“郝母虽教人西乐作曲，却极力主张中国人应研究国乐。”⑲至于杨荫浏对郝路义的影响，就更少有人提及了。其实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双向受益的。曹安和在回忆文章《杨荫浏》中就写到“杨荫浏教她吹笙、昆曲及音韵学。互教互学，成忘年之交”。⑳

国内近年来有关杨荫浏的个案研究时有出现，研究资料也臻于完善（如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年出的 13 卷本《杨荫浏全集》）。但对杨先生的英文论著的关注不够，更谈不上对中文以外的档案资料的利用。而毕业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曾在艺术研究所工作过的澳大利亚学者米思奇（Peter Micic）的研究却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米思奇的《采集一个民族的音乐 杨荫浏的人生缩影》（载李海伦编《中国音乐人生》美国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99 年）就为学者日后研究杨先生与郝路义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他文中提到芝加哥纽伯瑞图书馆（The

Newberry Library）收藏有郝路义1912-1943年间写给其姊尤妮斯·娣简丝的私人信件。但米思奇好像没有意识到娣简丝就是郝路义的大姐。纽伯瑞图书馆特藏部所藏的24箱与娣简丝有关的卷宗中，米思奇说有"26个文件档"与郝路义有关，其中一个文件档是"中国歌曲"（内有10篇文献，有词曲），一个文件档是"中国照片"，其他24个文件档是郝路义与娣简丝的信件。米思奇还提到郝路义在信件中多次自豪地提起杨荫浏，在一封1939年8月13日寄自昆明的信中，郝路义写到："我的教子厄内斯特·杨（笔者按 杨荫浏的英文名为Ernest Yang）是最勤奋用功的诗人和音乐家。"㉑2002年2月米思奇在无锡调查基督教教堂时曾专门访问了位于无锡中山路130号的原系中华圣公会江苏教区在无锡建造的主要教堂无锡基督教堂。通过与一位七十多岁的已退休的牧师的交谈，他得知杨荫浏曾定期地参加此教堂的礼拜仪式。㉒杨荫浏当然不是第一个创作赞美诗的华人教徒，但他却和吴历（1632-1718）、席胜魔（1835？-1896）等少数在圣诗本土化过程中做过突出贡献的教徒一样，是外国传教士最引以为荣的[2]。因为他不仅信仰虔诚、中英文俱佳，在音乐上的造诣也是其他教徒无可比拟的。郝路义甚至把她"发现杨荫浏"这一事实自豪地称作是她"对中国教会最大的贡献"。㉓

三、郝路义、中国古代诗词、抗战歌曲

郝路义的姐姐尤妮斯·娣简丝在其自传《世界与我擦肩过》中提到郝路义时有这样一段话："她是一个有才能的音乐家（大英博物馆曾发表过她有关中国音乐的研究成果），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好的诗人，她也是一把翻译中国诗词的好手，曾为《大西洋月刊》[3]撰过稿。她还是个圣人，虽然她不喜欢我们这样说她。"㉔

尤妮斯并不是在为她的妹妹吹嘘，郝路义的确在当时还在大英博物馆东方版画与绘画部任职的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D. Waley，1889-1966）编辑的《1924-1925东方艺术与文化年鉴》（*Yearbook of Oriental Art and Culture 1924-1925*）上发表过题名为《中国诗的曲调》的论文，文中除讨论中国诗的形式外，还附有她所翻译的中国古诗9首，其中4首还附有裘昌年、金寿山（译音）唱念，她用五线谱记谱的古诗4首（Hammond 1925）（左侧谱例由裘昌年吟唱《诗经》词、郝路义记谱）。韦利是20世纪公认的最有成就的汉学家之一，尤其是在汉诗英译上，他的成就至今还没有人超越。㉕能在他编辑的书中讨论中国诗词是需要有一定的水平的。在此论文中，郝路义除提到韦利的译著外，还提到佛罗伦丝·艾斯考夫（Florence Ayscough，1878-1942）、洛威尔（Amy Lowell）、海伦·瓦黛尔（Helen Waddell，1889-1965）、维特·宾纳尔（Witter Bynner，1881-1968）的译作[4]，充分显示了她对20世纪初期在美国掀起的第一次

---

2 近期有关吴历（渔山）的研究，可参见Jonathan Chaves，"Wu Li（1632–1718）and the First Chinese Christian Poet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122，No. 3（2002），pp. 506–519. 关于传教士对席胜魔的颂赞，请见Mrs Howard Taylor，*One of China's Scholars: The Early Life and Conversion of Pastor Hsi*（Shanghai: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00），pp. 269–270; C. S. Champness，"Hymnology in the Chinese Church，II" i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1912），p. 251; William Munn，"Chinese Hymnology"，*The Chinese Recorder*，Vol. 42（1911），p. 709.

3 《大西洋月刊》是美国的一种文学和艺术评论性期刊，其性质类似《读书》月刊。第一期于1857年11月在波士顿出版。发起人有哲学家、作家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诗人、教育家、语言学家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医生、哈佛大学教授、诗人、作家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和诗人、批评家、散文家、外交家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的小说最初就是在此刊物上发表的。

4 生在上海并在中国久居的艾斯考夫和洛威尔合作翻译《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1921年首版。生于日本东京的爱尔兰女诗人、翻译家瓦黛尔曾在牛津大学任教，译有选自《诗经》的《中国古代诗歌》（*Lyrics from the Chinese*，London: Constable，1913），后又写成关于中世纪诗歌和诗人的文章《漫游四方的学者》（*The Wondering Scholars*，London: Constable，1927）。美国诗人宾纳尔20世纪初曾来过中国，与江亢虎（1883–1954）关系甚笃，俩人合作十多年（1918–1929）合译的《唐诗三百首》（*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New York: Knopf）于1929年在纽约出版。宾纳尔后又将《道德经》（*Way of Life According to Laotzu*）翻译成现代美国口语出版，扉页上也有"献给江亢虎"之字样。

翻译学习中国古诗高潮的关注 [5]。

笔者虽然还没有查到她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翻译诗，但却在其姊编辑的《诗刊》上发现了她为日本留美学者小畑薰良（Shigeyoshi Obata）《李白的诗作》（E. P. Dutton and Co.，1922）一书撰写的书评[26]。小畑薰良（1888-1971）的译作共选译李白诗 124 首（包括杜甫等有关李白的诗 8 首）。此译作不仅在西方文学界颇有影响，在音乐领域也激起了一些波澜，如英国作曲家、指挥家阿瑟·布里斯（Arthur Bliss，1891-1975）的组歌《子夜四时歌》（*The Ballads of the Four Seasons*，1923）、和康斯坦特·兰伯特（Constant Lambert，1905-1951）的组歌《李白诗八首》用的就是小畑薰良的译作[27]。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译作 1922 年在欧美出版后，在国内也引起过争论，如 1926 年，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就围绕这部译作在《晨报副刊》开展了一场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28]。郝路义在小畑薰良书刚一出版就加以评论，可见她对中国诗词的关注。在音乐方面，除了以下所要谈到的她的有关论文和她在《普天颂赞》中的赞美诗曲外，中国艺术院音乐研究所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现还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5 月出的她编配的《梅花三弄》钢琴谱和此谱 1927 年 1 月的再版本[29]。

郝路义不但翻译古诗，对新诗她也有所涉及。她抗日战争时期翻译的现代歌词也曾被人引用[30]。除配曲外，郝路义也创作和翻译歌词，原金陵女子学院音乐教授葛星丽（Stella Marie Graves）根据美国汉学家马尔卡姆·法雷（Malcolm F. Farley，1896-1941）所采集的闽江船工号子曲调改编创作的《闽江船歌》中第六、第七首的歌词就出自郝路义之手，第八首的歌词（杨荫浏作）也是郝路义翻译的[31]。由李抱忱编辑、1943 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抗战歌集《抗战中国的歌曲》（*Song of Fighting China*，New York: Chinese News Service，1943）中所包括的 22 首歌曲，有 6 首的歌词——《长城谣》、《游击队歌》、《出征歌》、《嘉陵江上》、《兵农对》、《满江红》——就是她翻译的。此歌集不但在海外同胞中颇有影响，在同情中国的国际人士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32]。此外，郝路义还在《教务杂志》上发表过讨论圣歌创作的《新素歌》（1920）（详见下文）和报道赞美诗发展现状的《为原创赞美歌所举办的一次征集赛》（1929）等与诗歌和音乐有关的文章。郝路义其他的译著仅笔者见过的就有她和别人译述的《新中国梦》（汉口：中国基督圣教书会，民国 26 年）、《传道斐洲三杰》（基督圣教协和书局，1920 年）。

四、郝路义、裘昌年、中国词乐与“新素歌”

郝路义虽然也曾跟杨荫浏学过民间乐器，但她最大的兴趣似乎是中国文人的词乐。她认为与其把中国歌词生搬硬套地配上现成的西洋曲调，不如认真研究中国句法的韵律节奏和断句手法，从中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适合中国教徒的做法。[33]和早期英国浸会宗的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1861-1935，也称苏维廉）一样，郝路义对中国音乐是下过一番工夫的。但她获得中国音乐知识的途径，很显然并非像早期耶稣教士钱德明（Jean J. M. Amiot，1718-1793）、新教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等那样来自中国古代典籍，而是来自于与中国社会的长久接触。通过几年的观察，她觉得中国文人读书和吟诗的方式与基督教早期的格利高里圣咏有“内在的”极其相似的地方，因此她认为通过继承和吸取西方基督教祭拜传统和经验、融合中国本土的特有的元素，一种新的属于中国人的教会音乐是完全有可能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她提出的“新素歌”（a new plainsong）的概念。[34]

把中国音乐与格利高里圣咏相比，郝路义并不是第一人。如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就有过类似的想法。他之所以把他在五台山听到的一首佛曲用到他 1883 年出版的教科书《小诗谱》中，就是因为其旋律与格里高里圣咏有相似之处。[35]但与李提摩太不同的是，李提摩太只是听了觉得相似就直接记录了下来，而郝路义则和苏慧廉在 1887 年夏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和中国人学唱歌、学拉二胡一样[36]，花了很大的力气研究格里高里圣咏与中国词乐相似的原理。而与她合

---

5 关于中国古诗 20 世纪初在美国的翻译与影响，可参见 Yunte Huang，*Transpacific Displacement: Ethnography，and Intertextual Travel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Chapter Three.

作、从而使她对中国文人音乐有深刻领悟的人是无锡名流裘昌年 6。郝路义是怎么认识裘昌年的呢？我们所知甚少。笔者所见的有关裘氏的资料也很少提到他是基督徒或他与教会的关系。但郝路义和裘氏之间的合作却在郝路义的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和裘昌年一起,他们为连祷歌配乐㊲，还为圣公会圣餐仪式创作了一整套他们自己称之为"圣十字架弥撒"(The Mass of the Holy Cross) 的音乐㊳。

用文人吟诗的方式为圣公会圣餐仪式创作一套适合中国自己的音乐的念头是郝路义偶然萌发的。用她自己的话说:"一天我在一个村镇里听到一组刚皈依基督教的男人在一起做晚祷告。因为他们还没有被现代的习俗惯例影响到,所以他们唱出来的祷词不是像常见的那样整齐划一式的刻板会话,而是有起有伏的齐唱,这种唱念祷词的方式不但极其诱人而且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他们当然会极力否认他们是在唱歌,争辩说一般中国人就是这样读书的。但是其效果却明显地令人欣喜并使人顿生虔诚之意。当时我就想,如果能让一个既懂语言韵律又知晓诗词平仄的好的中国学者仔细研究礼拜仪式的每个短语的意思,他或许会创作出一套既绝对正确又能充分显示出文理韵味的唱咏的曲调。"㊴幸运的是,郝路义不仅找到了这样的文人,而且找到是裘昌年这样诗词书画俱佳的无锡名流。用她自己的话说:"裘先生以文章闻名邑中,在无锡一带声望颇具,曾当过地方官,他同意为我工作。"㊵

在运用中国人熟悉的音乐语言来传播基督教义这一点上,很多传教士都曾有过尝试。如在山东青州传教的英国浸礼宗的李提摩太夫妇、库寿龄夫人㊶等早期的新教传教士等，但他们都采用的是"拿来主义"的方式,所选择都是他们认为中国人容易学会的五声音阶的曲调。如李提摩太夫人除推荐用苏格兰的民间曲调(如"友谊地久天长")和美国黑人"欢歌"(Jubilee airs,如"Swing Low"、"光明的天堂"(In Bright Mansions Above)、福音列车(The Gospel Train)和"Steal Away to Jesus")等类似的西洋曲调填歌词㊷外,还建议用中国的《老六板》、《步步高》、《普天乐》、孔庙唱颂音乐和佛教寺庙歌调作为教材。美国监理会的查尔斯·查姆普尼斯(Charles S. Champness)和活跃于华中地区的汉口伦敦会的潘雅德(Arthur Bonsey)等也竭力主张避免在乐曲中用半音。他们除了推荐"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山梗河边"(Ye Banks and Braes) 这些五声音阶的苏格兰传统乐曲外，还建议使用美国通俗流行歌曲"衣阿华"(Iowa)、"肯塔基"(Kentucky)、"丛林"(Forest)和"和谐林"(Harmony Grove)等。㊸以上提到的苏慧廉牧师除主张教会礼拜所用的音乐应该尽可能的避免用半音,多用苏格兰、爱尔兰民歌旋律外,甚至还鼓励传教士们在基督教祈祷仪礼上采用中国乐器。7 ㊹

与上述传教士这种急功近利的"拿来主义"做法不同，郝路义更感兴趣的是创作有中国特点的、原创性的教会音乐。她认为与其采用西方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大、小调音乐体系来创作中国教会中所用的音乐,不如回到大、小调音乐体系之前的多调式的基督教会音乐。鉴于中国音乐旋律性强、与语言接近、所用调式多的特点,借鉴和参考统治西方一千多年并强烈地影响了 20 世纪作曲家的广义的"调式"音乐——特别是格利高里圣咏——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郝路义之所以做出中国文人读书和

---

6 裘昌年(1869-1931)出生在无锡的官宦之家,是官居四品曾任浙江乍浦海防府知府裘蕴山的长子。他本人虽是前清秀才,但他身边也不乏改革求新之人。因创办中国第一张白话报《无锡白话报》而闻名的裘廷梁(1857-1943)是他的叔叔,有中国第一女报人之称的裘毓芳(1871-1909)是他的大妹。他的儿子裘维蕃(1912-2000)是植物病理学家,生前是中科院院士。裘昌年曾任孙传芳幕僚,与无锡诗人、书法家孙揆均(1866-1941),藏书家、书目专家丁福保(1874-1952),革命家、书法家吴稚晖(1865-1953),画家吴观岱(1862-1929)等关系都甚笃。除词章外,裘昌年也以书画闻名,他的书画至今仍有拍卖。

7 除了李提摩太夫妇、库寿龄夫人、苏慧廉外,别的传教士也纷纷就五声音阶的问题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意见,如在陕西内地会的金辅仁(Geo King),"Hymns and Music in China",20(1889):133-134;天津英国卫理公会教士甘淋(G. T. Candlin,1853-1924),"Chinese Hymnology",24(1893):167-173;在上海、苏州和宁波生活了五十多年、曾主编《教务杂志》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G. F. Fitch,1845-1923),"Hymns and Hymn Books for the Chinese",26(1895):466-470;福州美以美会宣教士瓦格(J. E. Walker,)"Pentatonic Music: Some Suggestions and Experiences",37(1906):497-499.

吟诗的方式与格利高里圣咏有“内在的”、“极其相似”的判断，是因为在她看来，中国诗词乐和西方基督教中大量传统仪式曲调（素歌）一样，都有单线条声乐旋律、在调式上不限于大小调、无伴奏、节奏自由、没有严格的小节划分等特点。换句话说，郝路义认为与其用与中国音乐风马牛不相及的、强调纵向性组合的西方功能性和声配中国的歌曲，不如用与中国音乐原理相似的、同样是线性的格利高里圣咏为坐标。

在郝路义看来，中国诗乐和基督教传统素歌的相似性首先表现在调式的运用上，其次是律制。和素歌用“多利亚、弗里几亚等”多种“正调式”和“副调式”一样，中国诗词乐用的是“宫、商、角、徵、羽”等多种调式音阶，与西方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大小调音阶相距甚远㊺。中国诗乐和素歌的另一个相似点是音律。和素歌一样，中国诗乐中所用的音阶是没有经过人工调律的“绝对的，或在科学上准确的音阶（absolute or scientifically accurate scale），而不是从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后我们的耳朵都变得习惯听的、一个八度整齐地分为十二个半音的音阶㊻。“就是这种绝对的音阶，使我们初听中国音乐时最反感，因为它的音程似乎给我们以走调的感觉。”㊼值得注意的是，郝路义没有把“绝对的，或科学上准确”这样的赞誉之词用来形容巴赫所用的平均律，而是把它们留给了中国诗乐和格利高里圣咏所用的律制。

郝路义还注意到，从节拍和节奏上来讲，中国诗乐所遵循的是语言的自然韵律，与韵文体的交替歌唱式的“诗篇歌”（Psalms）和罗马天主教黄昏祷和圣公会晚祷的“圣母颂歌”（the Magnificat）[8]相近，而离有固定诗韵和节奏的、且通常是反复歌唱的赞美诗（hymn）则有相当的距离㊽。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郝路义才开始在注重细微旋律和自由节拍的“新素歌”的创作上下功夫。在郝路义的敦促下，裘昌年不厌其烦地把基督教圣诗和祈祷文一遍一遍地用词乐的方式唱诵，郝路义也耐心地尽力把旋律用五线谱记录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裘昌年“为圣餐礼仪的所有不同部分——如慈悲经（the Kyrie）、圣哉经（the Sanctus）、荣耀经（the Gloria in Excelsis）等——都创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曲调”㊾。这些曲调并非只是已知中国老歌的记谱或改编，而是融合不同民间风格的实际意义上的创作。用裘昌年自己的话说：“慈悲经（the *Kyrie*）在总的风格上与常被讨论的唐代的戏曲音乐昆曲无异。信经（the Creed）和上帝之祷（Lord's Prayer）有些许效仿道教仪式唱诵的意味，但道教仪式唱诵本身可能在风格上源自昆曲。荣耀经（the Gloria in Excelsis）在写作形式上以爱国歌曲为原型，而降福经（the Benedictus Qui Venit）中人民的呼喊……则是通过船工干苦力活时所用的无词副歌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出来。”㊿郝路义和裘昌年创作的这些歌调虽然多种多样，但从本质上来讲都很简单，易于传唱。“用 F 调，不用升降号就可完全写出来，在演唱上也不超出普通信众的音域。有些歌——如荣耀经——有很固定的节拍，用 $\frac{2}{4}$ 拍写成。别的部分——如信经——虽没有固定的节拍，但也自然地服从着某种韵律，就像英文散文的节奏一样。”(51)在音阶和调式的选择上，“新素歌”虽大部分用五声音阶，但并不局限于五音。大调七声音阶和半音也常用到。郝路义和裘昌年合作的这些“新素歌”后来被无锡的“圣十字架教堂”采用，每个星期天都被用到，完全取代了他们先前用格利高里圣咏曲调改编的圣曲。为了使全国各地的教堂都能利用他们的创作成果，裘昌年后来还对其中的一些曲调根据北方官话的特点做了改动。到 1920 年郝路义在《教务杂志》上发表其《新素歌》时，全国已有多所教堂采用他们的“新素歌”(52)。

结　语

杨荫浏先生生前曾数次提到郝路义对他的知遇提携之恩。遗憾的是，我们在探讨杨氏的成就时却极少谈及郝路义本人。本文从郝路义本人的家庭背景、郝路义与杨荫浏的交往、郝路义有关中国古

---

8 Magnificat 是拉丁文“圣母颂歌”的意思，也有译成“圣母玛利亚的圣歌”，歌词取自《路加福音》（我的心赞美上主）。巴赫、爱沙尼亚作曲家帕尔特（Arvo Pärt，1935-）等都创作过 Magnificat。Magnificat 是拉丁文圣经中该颂歌的第一个词（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ium，即‘我的心赞美上主’）。是罗马天主教黄昏祷和圣公会晚祷的一部分【圣公会晚祷的配乐后面连接西面颂（Nunc Dimitis）】。在罗马天主教礼拜仪式中用素歌曲调演唱，在圣公会礼拜仪式中则用圣公会圣咏。详见迈克尔肯尼迪、乔伊斯布尔恩编《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年，第 713 页。

代诗词之论著、郝路义的音乐理论与实践四方面对她的生平业绩做了简略的叙述。通过聚焦她与裘昌年的合作,本文还凸显她在中西音乐融合上所做的尝试。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郝路义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除扮演伯乐的角色外,在基督教音乐华化、诗词学和翻译学三个领域也都有值得注意的建树。其中基督教音乐华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人音乐的借鉴吸收上,而她在翻译学上的建树则呈现在抗战歌词的翻译上。本文的讨论当然无法穷尽这些议题,但作为抛砖引玉之举,如能引起国内学者兴趣,也不枉笔者之苦心。

(责任编辑 郭 威)

---

① Eber, Irene :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I.J.Schereschewsky (1831–1906). Leiden & Boston & Käln: Brill. 1999.

② 许布曾 :《圣约翰大学创始人:施约瑟》,《档案春秋》2006 年第 2 期。

③ Barry, Stuyvesant :*Hammond as in Organ –The Laurens Hammond Story*.http://thehammondorganstory. com/ (Accessed 26 July 2010), 1974.

④ Tietjens, Eunice. The World at My Shoulder. 1938.pp3–13.

⑤ 同注④,第 11 页。

⑥ Aldridge, Henry B.:'Music's Most Glorious Voice': The Hammond Org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19:3.1996. pp1–8.

⑦ 转引自卢惠余 :《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辩证》,《河南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第 135–137 页。

⑧ Tietjens, Eunice. The World at My Shoulder. 1938. pp 22–24, 59–61。

⑨ Love, W. N. S. :Eunice Tietjens: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PhD. Dis., University of Maryland.1960.

⑩ 同注⑧,第 70 页。

⑪ 参见田青 :《杨荫浏与中国宗教音乐》,《音乐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62–76 页 ;周颐 :《赤子心怀有隐曲——杨荫浏学术史事抉微》,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8 届硕士学位论文。

⑫ 乔建中 :《杨先生的音乐之路》,《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 4 期。

⑬ Chinese Recorder :Arrivals, *The Chinese Recorder* 44.1913.p718.

⑭ 华蔚芳、伍雍谊 :《民族音乐传统接力赛的健将》,向延生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 381 页。

⑮ 杨周怀 :《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 4 期,第 39 页。

⑯ 刘再生 :《杨荫浏关于音乐问题的一次谈话》,《音乐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⑰ 乔建中 :《杨先生的音乐之路》,《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 4 期。

⑱ 周颐 :《赤子心怀有隐曲——杨荫浏学术史事抉微》,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8 届硕士学位论文,第 15 页。

⑲ 同注⑱。

⑳ 同注⑱,第 16 页。

㉑ 转引自 Micic, Peter :Gathering a Nation's Music: A Life of Yang Yinliu (1899–1984).*Lives in Chinese Music* edited by Helen Re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p99–107.

㉒ 同注㉑,第 94–95 页。

㉓ 同注㉑。

㉔ 同注⑧,第 11 页。

㉕ Hawkes, David :Arthur Waley, *Asia Major* (New Series) 1967 (12).pp145–147.Spence, Jonathan D. :Arthur Waley, *Chinese Roundabout–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W. W. Norton.1992.pp329–336.

㉖ Hammond, Louise Strong. :Review: Interpreting a Master: *The Works of Li Po* ;Shigeyoshi Obata, *Poetry*, 22.6.1923.p334–337.

㉗ Hsieh, Chinghsuan Lily:Chinese Poetry of Li Po Set by Four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Composers: Bantock, Warlock, Bliss and Lambert. (D.M.A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4.pp77–124.

㉘ 邬国平、邬晨云 :《李白诗歌的第一部英文译本——小畑薰良译〈李白诗集〉、译者与冯友兰等人关系及其他》,《江海学刊》,2009 年第 4 期。

㉙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 :《中国音乐书谱志》(增订本),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年,第 126 页。

㉚ Graves, Stella Marie :Music Education in China,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1946 (1).p26.

㉛ 同注㉚,第 27–37 页。

㉜ 曲文静 :《中国近代合唱事业的先驱——音乐家李抱忱百年诞辰纪念》,《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

㉝ Hammond, Louise Strong :A New Plainsong. *The Chinese Recorder* 51.1920.p179.

㉞ 同注㉝,第 180 页。

㉟ Richard, Timothy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London: T. Fisher Unwin.1916.p171.

㊱ 宫宏宇:《传教士与中国音乐:以苏维廉为例》,《黄钟》2008 年第 1 期。

㊲ 同注㉝,第 184 页。

㊳ 同注㉝,第 180 页。

㊴ 同注㉝，第 180 页。

㊵ 同注㉝，第 181 页。

㊶ Couling，Mrs.：*Pentatonic Tune Book* Shantung: Presbyterian Press.1895.

㊷ Richard，Mary：Chinese Music，*The Chinese Recorder*，1890（21）.p310.

㊸ Champness，C. S：Pentatonic Music and Kin-dred Matters，*The Chinese Recorder*. 1905.pp 560-561. Bonsey，Arthur :Chinese Hymnology and Church Music，*The Chinese Recorder* .1905.p285.

㊹ Soothill，William E. :Chinese Music and Its Re-lation to Our Native Services，*The Chinese Recorder* 21. 1890. pp226-228.

㊺ 同注㉝，第 182-183 页。

㊻ 同注㉝，第 183 页。

㊼ 同注㉝，第 182-183 页。

㊽ 同注㉝，第 180 页。

㊾ 同注㉝，第 181 页。

㊿ 同注㉝，第 181 页。

51 同注㉝，第 182 页。

52 同注㉝，第 181 页。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论坛

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西南大学音乐学院、中国矿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联合举办（矿大艺术与设计学院承办）的“2010 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论坛”，于 2010 年 11 月 24-26 日在江苏徐州中国矿业大学举行。

此次论坛既是学术交流，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第二次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2008 年 5 月在西南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科研院所、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师范院校、表演团体及新闻出版等数十家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分别就“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个案调查与研究”和“有关‘非遗’保护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其他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并观摩、考察了具有徐州地方特色的音乐表演和文化遗产。

论坛对传统音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有力推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程。

（论坛会务组 供稿）